

25.14

大理州文史資料

第二輯



目 录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大理地下党活动概说	
.....黎 旭 朱润符 王 灿 李 品	(1)
上下江游击队	
.....杨再春	(11)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李 澄	(26)
鹤庆解放前后——我的回忆	
.....杨维基	(41)
大理国师“学潮”纪实	
.....那泽远	(51)
张结巴的一些活动情况	
.....(白族)张 穗	(73)
滇西的匪乱与兵燹	
.....罗 纶	(81)
四十年代的下关社会风貌	
.....吴 棠	(89)
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	
.....舒自志	(96)
福春恒兴衰史	
.....蒋万华	(109)

鹤庆土布小史	熊元正 (120)
巍山丛会概况	郭乃文 (128)
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	段丽本 (139)
读段长老“大理基督教会简史略稿”后	李全本 (159)
白族诗人赵式铭文学生涯琐纪	杨适夫 (161)
大理州鼠疫防治纪要	龚克昌 (169)
大理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概况及防治进展	尚敏 (195)
旋毛虫病在大理州流行概况	梁炳学 (216)
大理白族取乳名习俗	杜乙简 (221)
《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补正	(236)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 大理地下党活动概况

黎 旭 朱洵符 王 灿 李 品

（一）从启蒙到建党

大理地下党的革命活动起于一九三八年，第一个地下党员是李仲烈（现名李松霖）。

李仲烈是禄丰县人，一九三七年在镇南师范经赵国徽介绍入党，一九三八年到大理省中任会计兼图书管理员。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是大理地下党开创工作的初期。在这期间，李仲烈通过向师生推荐进步书刊，协助进步教师林志音组织“省中歌咏队”和编《省中壁报》等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开展革命的启蒙工作。当时，在李仲烈的周围，团结了进步教师林志音、王熙民和进步学生朱洵符、肖国源、沈裕华、侯若林、范诗、董定藩、赵维翰、李景春、邓守敏、杨寅、张树森、阎士颐、王立权等，并通过他们团结和联系更多的倾向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并于一九四〇年组织发动了为抗日将士劝募寒衣的活动，把募捐所得悉数汇交宋庆龄同志。

一九四一年初，云南地下党省工委派青委委员李之楠到了大理，与李仲烈联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在李仲烈前段工作的基础上开始建党工作，于一九四一年春夏先后发展了地下

党员吕和章、赵汝訥、朱洵符、肖国源、侯若林、董定藩、杨福庆、赵维翰、张树森、董蔣、邓守敏等二十四人。从此，大理地下党的工作迅速发展，先后在大理城区、下关和喜洲建立了十二个工作点，主要是通过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培养和团结进步青年，并初步开展了统战工作和敌工工作。这时，十二个工作点中，尤以大理省中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进步空气浓烈：省中歌咏队多次公演进步歌咏和戏剧，《省中壁报》贴到校外城内主要街口，省中图书馆陈列的进步书刊琳琅满目，到图书馆学习的进步师生络绎不绝。党组织还组织了读书会，读书小组，以党员为骨干，团结一批进步青年，有组织有计划地传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

一九四一年夏末秋初，省工委又派李伯梯到大理，传达省工委关于执行十二字方针的措施。

（二）从隐蔽埋伏到开辟农村工作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波及到大理。在大理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开始追查大理地下党的活动，并沿途缉捕李之楠同志。为避免敌人破坏，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李之楠、李伯梯、李仲烈等三同志，于一九四一年底先后离开大理。大理省中的进步教师林志音和王熙民也转移到了其他县份。于是，大理地下党的工作转入隐蔽、埋伏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的阶段。

李之楠等三同志临离开大理之前，曾分别叮嘱留在大理的地下党员：按党的十二字方针隐蔽埋伏下来，转入开展为形势所允许的交朋友、个别培养进步青年等工作；密切注意《新华日报》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总方针，学会人自为战，独

当一面；同时耐心等待上级党组织来联系。但李之楠等三同志到昆明后，一直未找到已转移、隐蔽的省工委，只得转到省外，在广西工作一段时间后，把大理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南方局的钱瑛同志。这之后，直到四十年代末期，大理地下党的二十四位同志，除吕和章一人在一九四八年经吴宗遥同志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外，其余二十三人都没有和上级党联上关系。但是，这二十四名党员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忘记党的事业和党员的义务。在度过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两年较艰苦沉闷的岁月后，从一九四四年起，他们中的好几位同志，如吕和章、赵汝訥、朱洵符、肖国源等，就单独作战，各自联系自己周围的革命青年，逐步开展为当时形势所允许的革命工作。他们既分别活动又互相配合起来教育培养原省中歌咏队、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和革命青年沈裕华、赵汝静、杨寅、王立权、王鸿熙等和进步教师赵子江、张光宇等，并通过这些同志联系教育、影响其他更多的进步学生吕舜章、李克光、杨荣祥、李德渊等。

由于吕和章、赵汝訥、朱洵符三个地下党员都是大理省中的同学，互相都很熟悉，吕又是赵汝訥入党时的监督人，因此，他三人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朱洵符休学回家时起，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就经常联系，团结一致，共同研究和开展一些地下工作。例如：继一九四四年冬秘密油印散发了评《中国之命运》后，一九四五年，朱洵符又领着王立权秘密油印了《论联合政府》，分送给在大理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进步青年学习。一九四五年七月，在党的七人精神鼓舞下，他们三人又经过多次研究，一致决定不能只在城区知识分子中活动，还必须立即到农村去，开辟农村工作阵地，以适应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接着于一九四五年八月

间，由吕和章带领在大理省中办了手续的王立权，到喜洲沙村跟当时任沙村小学校长的革命青年杨济舟共同办沙村小学，以沙村小学为依托，开辟农村工作阵地。赵汝訥继续坚持城区工作，朱海符则回到云大复学后保持与大理的信件联系。

吕和章、王立权和杨济舟在沙村开辟农村工作是比较艰苦的。由于沙村小学规模小，只是农村初小，容纳不了几个教师，于是，为了党的事业，他三人只领两个教师的薪金。上课时认真搞好教学，以取得学生及其家长们的信任；课后就利用访学生家长的机会，与村中农民接触，了解情况；发现积极分子；晚上还办农民夜校，对农民中的青壮年进行文化教育并逐步开展传播革命思想的教育。现在云大化学系任教的杨春景即当年沙村小学的学生，现任大理州农校副校长的李龙文即当年沙村农民夜校第一期学员。他们同时在喜洲镇办了一个壁报，名叫《喜洲街上》，评述国家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狂征暴敛和妄图发动内战、屠杀革命人民的阴谋。这个壁报都是深夜到喜洲镇闹市区粘贴出去的。他们还到华中大学、五台中学和喜洲完全小学交朋友，联系、团结进步教师沈柏春、进步学生杨增奎、郭文龙等。这时他们还把地下党原分散隐蔽在大理城区几位同志家里的数百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书刊，陆续运到沙村，在沙村小学内办了一个秘密的图书室，经常抽时间选学其中的一些著作。

（三）响应“一二·一”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大理地下党先后在喜洲、大理城区组织了声援和响应昆明学生运动的活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在云南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宣传委员的朱沅符及时把昆明发生“一一·二五”事件的消息传递到大理。吕和章、王立权、杨济舟三人就在喜洲与华中大学革命学生杨增奎、郭文龙取得联系，跟地下党员五台中学教师沈柏春一道，参加了华中大学的“时事座谈会”。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声援昆明学生的通电。紧接着，昆明发生了“一二·一”事件，大理几所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纷纷酝酿罢课以响应昆明学生争民主、反暴行的运动。于是，十二月上中旬，王立权、吕和章就先后回城，与赵汝訥、张光宇、王鸿熙共同负责组织大理几所中学的罢课斗争。当时，由吕和章、赵汝訥负总责，具体工作则由王鸿熙、张光宇负责女中，王立权负责省中。王立权除通过进步学生杨荣祥在校内串连发动同学之外，还邀约女中、省中和县中的进步学生代表杨荣祥、李克侠等四、五人在杨荣祥家楼上开过几次秘密会议，研究罢课斗争的策略，协调三所中学的行动，并研究如何争取国立大理师范的学生也参加罢课斗争的问题。十二月中旬，大理省中、女中、县中相继罢课，并组成了临时学联，由杨荣祥、赵清、杨振河（均省中学生）、赵汝静、李克侠、何其芬（均女中学生）等人负责。罢课一周多时间后，还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国师也有部份学生冲破校方阻挠参加了）。五台中学则由学生小组到附近农村宣传反三征。游行前一天，一方面通过统战工作敦促第二军不要干涉学生的正义行动，另一方面由学生代表李克侠、赵清等到第二军军部谈判。这两方面的工作，使游行示威当天，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游行示威的头天晚上，国民党军警宪特在大理搞了宵禁和户口清查。当晚，吕和章、张光宇、王鸿熙和王立权都集中在王

立权的祖母住处，为第二天的游行示威通宵编写油印《学运快报》、传单和标语口号。幸好王立权的七十多岁的祖母是住在偏僻的响水关北街，平时又只有一个八岁的小孙女陪着她住，地方保甲都知道这一情况，因而当晚敲了几下门，没人应声就免于清查了。

（四）建立党的外围组织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在城区坚持工作的赵汝訥同志和张光宇同志，先后认识了当时在大理女中兼课的范毓南。这时王鸿熙也到大理女中任教。随后，吕和章、王立权也先后认识了范毓南，并从范处得到《渝风》、《民主生活》等小册子阅读。范原在皖北风台区做党的工作，当时则在大理工合办事处任职。他与周新民、楚国南都相识。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周新民和楚国南分别写信给他（由昆明民盟总部的李克党到大理亲交），要他协助在大理建立民盟组织。范将这一情况告诉给赵汝訥和张光宇，并约吕和章进城一块作了研究。当时大理地下党的同志正苦于一直在寻找党的上级组织都没有找到，于是决定接民盟昆明总部的委托，把即将建立的大理民盟作为大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以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培养和积聚革命力量，并拟通过民盟关系迅速找到上级党组织，更好地开展大理地区的革命斗争。

大理民盟初建时，参加的有地下党员吕和章、赵汝訥、范毓南和进步教师张光宇、赵子江。随后参加的有王鸿熙、王立权、杨济舟。一九四六年后，陆续参加的有杨寅、赵汴、李景春、周凤歧、苏经文、马焕珍、杜开祥、曹德馨、段伯苍、丁步先、杜承钧、冷浩然，在牟定的盟员蒲显明、王瑾也同大理民盟联上了关系。

大理民盟建立之后，一方面与民盟昆明总部有着组织上的联系，在一九四六年，昆明总部除向大理民盟提供了成批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之外，还派普梅夫到达大理联系过。另一方面，大理民盟又是大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它以地下党员为核心力量，按照党的领导和号召开展革命工作，并保持着与昆明的朱范符等同志的联系。

（五）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扩展

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是大理地下党工作的发展时期。

一九四六年初，农村工作由沙村一个点扩展到喜洲、沙村、赤土江村三个点。由吕和章协助进步青年赵汴去接收喜洲完全小学（该小学是通过城区统战工作，由县教育局委派赵汴去任校长的），开展喜洲镇工作；由杨济舟和革命青年杨寅负责沙村的工作；由王立权去办赤土江小学，开辟赤土江村的工作。由于喜洲完全小学规模较大，所以还从大理城区和下关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来任教师，如杨振河、李景春、傅赞言、马焕珍、曹德馨、章怀德、安淑媛、杜秉厚、蔡正华、邓世超等。

这时，农村三个点除对学生、学生家长和青壮年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之外，主要是把在喜洲、沙村和赤土江村工作的三十多个青年教师团结起来，充分利用设在沙村的秘密图书室的藏书，分别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文献。同时组织了“火花歌咏队”，由王立权负责指挥，每星期四上午在沙村小学内练唱，并于“五四”运动二十六周年时举办了纪念晚会，演唱《黄河大合唱》、《青年颂》、《农家苦》、《播种之歌》、《茶馆小调》、《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

李、闻惨案发生后，还组织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和声讨暗杀李、闻的国民党特务的集会。

这时，大理城区的工作也有扩展，除统战工作有所发展外，主要是在大理国立师范也开展了工作，以周凤歧为核心，把革命书刊散布进这所比较保守的学校，在一部份同学中组织阅读，开始改变沉闷的空气。周毕业以后，他和苏经文就到农村基点工作。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追查大理响应“一二·一”运动的组织者，而追查到王鸿熙和王立权，于是党组织决定王鸿熙和王立权转移到牟定中学去工作，周凤歧到赤土江，杨寅到喜洲完小，苏经文到沙村。一九四六年底，喜洲完小的工作也受到反动当局的注视，校内并出现“喜洲小学是共产党分子赵、吕的大本营”的标语（赵指校长赵汴）。县长撤换了校长。于是，党组织决定赵汴转移到景东简师工作，吕和章随杜开祥，王立权转移到永胜县中工作，马焕珍转移到玉溪，张光宇、杨寅、苏经文则到宾川，在半井采凤村租了几十亩地办一个以种棉花为主的小农场，准备用劳动所得筹集开展武装斗争的部分经费。国民党反动派对大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工作的追查，迫使上述许多同志不得不转移工作地点，但同时也使大理地下党的工作扩展到牟定、永胜、宾川等县。在牟定中学和永胜中学教育影响了一批有志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随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并成为党的骨干。例如现在的牟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丕宽、宣传部长戴先隆以及玉溪县委党校副校长赵凤歧，都是当时牟定中学的学生，现在省委党校工作的陈兆昌、陈湘芹则是当年永胜中学的学生。

一九四七年冬，范毓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他

经不住考验，招认了地下党员吕和章、赵汝訥和其他革命同志杨济舟、王立权、张光宇、杨寅、杜开祥、李景春、周凤歧、丁步先、王鸿熙、王锦、蒲显明等十多人。但当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卢汉发出了给大理县长徐箴云查报上述同志的密令，稍后云南省警备总部霍揆章又发出了通缉令，但由于这些同志中的绝大多数早已转移他地，因而未受到大的损失。

一九四七年底，大理地下党就只留下有着良好社会关系掩护的赵汝訥一人。他继续联系留下的革命青年杨济舟、曹德馨、杜开恒、吕舜章、章怀德、蔡正华、赵汝静、赵汝贤等等坚持革命活动，直到一九四八年滇西地下党重建。党的外围组织大理民盟，则从一九四七年底起就没有再活动了。原大理地下党的党员和其他革命同志的绝大多数，在一九四八年或一九四九年都在不同地区参加了反蒋武装斗争，比如弥泸区有王立权（即王灿）、王柏林（即王家栋）；九、十支队有肖国源、王鸿熙（即王道之）、杨均（即杨光业）、杨寅（即李品）、苏经文（即赵征）、吕和章（即黎旭）、杜开祥（即杜军）、杜承钧（即刘明）；纵队部有丁步先；七、八支队有杨振河、李克光、吕舜章、赵清、段伯苍、周凤歧、章怀德等人。他们都先后接上党组织关系，重新入党或并被各地区党组织吸收入党。吕和章在曲溪接上了党组织关系；赵汝訥、朱洵符由于当时大理地下党组织未给他俩接上党组织关系，只得在大理重新入党；王立权、杨寅、杜开祥、杨济舟、杜承钧、冷浩然、周凤歧、苏经文、段伯苍等分别在罗平、曲溪、昆明、大理、邓川等地入党；王鸿熙、马焕珍等分别在石屏、曲靖入党。此外，在各地入党的还有丁步先、王家栋、赵清、曹德馨、傅赞言、杨光业、杨振

河、李克光、赵汝静、赵汝贤、沈裕华等共计二十六人。肖同源于一九五零年在景谷李希哲叛乱时壮烈牺牲。蒲显明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在牟定被国民党保安团逮捕杀害。王瑾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牟定湘阴武工队伏击县长时被误伤身亡。

现在，事隔四十多年，知道情况的人已经不很多，解放前处于地下状况，党的活动当然外人无法知晓；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述诸人遭到不同程度的错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将是非弄清，还历史本来面目。应该说，武装斗争并不是一轰而起，而是红军长征就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又有若干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连续不断在这里苦斗。不这样，也就不成其为历史。

这篇材料虽经许多当年在大理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反复研究、订正过，但由于写的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希望知情的同志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日

上下江游击队

——滇西北第一支游击武装

杨再春

上下江地处澜江夹谷，为剑川、洱源、漾濞、云龙四县交界的白族聚居区。土地贫瘠，民风纯朴。在国民党统治下，征兵征粮，苛捐杂税及乡保长的敲诈勒索，劳动人民过着冻饿的生活。成年男子，为了躲兵逃避他乡，妇女到乔后井背柴背蕨，田园荒芜，十室九空。四八年秋，我党即派来了地下工作人员，发动群众，组织起农抗会，开展反三征（征粮、征兵、征税）的斗争。随着斗争的发展，在外躲兵的青年们也纷纷回来了，农抗队伍壮大了，斗争深入了，很多村寨的乡保政权被推垮了。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必须建立起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中共罗荃特区区委的领导下，于四八年冬，在上江下江两个乡自卫队的招牌下（当时由于对洱源县长甘舜统战工作的成功，所以游击队取得了合法的招牌），组建成立了我们自己的武装。我因为四八年底，在宾川四角山建立武工根据地，被敌人捣毁，计划除夕夜攻宾川城，举行全县暴动不果，而身份暴露。地委乃于四九年二月初，将我调来上下江地区，负责领导这支游击队。队部设在上江石月明村后面的一所破庙子里，庙门上挂着“洱源县上江乡自卫队”的牌子。有二

十来个队员，都是当地的农抗会员，队长何桂昌（原是乡上的田粮征收处主任，人们都叫他何主任），为人有胆识，作战勇敢，有大烟瘾。武器有长短枪十三支，好枪六支（三支外造，三支本省造），其余都是老毛瑟、翻天拒盖等破旧武器。因经费支绌，平常脱产住队部的仅十七人，需要武装出击时，临时抽调农抗会员补充参加。

我负责政治领导，抓部队的训练。每天三操两讲堂，即三小时的军事课，两小时的政治课。军事课讲军事常识，班排教练、攀扒、跳卧、射击、投弹等野外演习；政治课讲时事、解放战争形势、长征故事、阶级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革命歌曲、学习上级党发来的文件……等。每周过民主生活一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次战斗结束，即进行总结。由杨苏同志代表区党委经常同我们联系，沟通特区领导和部队之间的关系。我们打击的目标，主要是对准乔后井的税警部队，也出击过毗隣地区的乡镇公所（如云龙官里乡、漾濞金脉镇），提取了他们的武器。也袭击过巍山大地主的马帮，充实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行动，经常是昼伏夜出，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战术上主要是打伏击战，“路祭”过往的税警部队和盐务官吏。一有情报，我们就立即行动。每次战斗，做到战前充分思想动员，临战时政工人员身先士卒，战后总结评奖，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叫做“火线入党”。

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和大小二十余次的战斗，部队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和锻炼。部队从小到大，力量加强了，素质也提高了，涌现出一批英勇善战的骨干，为党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的优秀干部。随着斗争的发展，政工力量加强了，上级又派来了周英（永胜人）、张念方（昆明人）二同志，部队

里也发展了党员二十余人，成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也发展了青年团员（当时称民青），建立了党、团小组。脱产的队员已由原来的十七人，扩大到一百二十多人。武器装备也大有改善，到解放前夕，我们已拥有好枪八十多支，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二挺，枪榴弹、手榴弹数百枚。弹药充足，士气旺盛，已经是一支经过实战锻炼的比较坚实的武装力量了。这支部队，实际上是边纵七支队最早的一支游击部队，已经成为滇西北地区党的最早最基本的武装力量了。

到五月上旬，我上下江游击队配合友军剑川大队，在欧根同志指挥下，经过两昼夜的战斗，一举解放了乔后。我游击队扩编为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第二大队（乔后大队），拥枪三百余。半年来，我们活动的地区，以罗坪山为主，南到漾濞金脉镇，西到云龙官里，北到温坡大树富罗禾一带，在广袤数百里的高山夹谷里，给税警队设下了天罗地网。先后打垮了税警队，解放了乔后井，收缴了四个县边境地区的乡保武装，击溃和消灭了两股“共革盟”土匪武装。经过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其中单是与税警队的交锋，就有二十来次之多。现将我亲身参加过的几次较大的战役，就记忆所及，概述于下。

一、永 安 桥 伏 击 战

二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太阳已落山了。杨苏同志跑来通知说：“明早上，税警队一个排，三十余人，送解库银到弥沙井。组织上命令你们，明天拂晓前，越过乔后，赶到乔后往弥沙间的大路上，伏击敌人，截取库银和夺取武器。”我当时心潮澎湃，自思我刚到此才一个礼拜，首次出战，必须夺取胜利，缴获全部库银，立下功劳，站稳脚跟和树立今后

工作的威信。当即召开了会议进行商讨。参加会议的人，除杨苏和我二人外，还有中队长何桂昌、分队长何正喜、王振邦等五人。对兵力部署、埋伏地点、火力配备、出发时间及退路等，都作了细致的讨论。会后，我即召集全体战士进行动员。作了全面部署后，提前睡觉，半夜一点起床，准备工作包括洗脸、吃饭、擦枪、捆背箩及乾粮等项，整整一个小时。两点钟，准时出发，拂晓前越过乔后，到永安桥附近，选择有利地形埋伏。我们一共出动了三十二人，其中十七人为战斗队，配备枪弹，十五人为运输队，各带背箩一只，砍刀或斧头一把。

两点正，队伍出发了，天色漆黑，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在闪烁的星光下，故意绕开了村子往山边小路行进。战士们斗志昂扬，满怀胜利信心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从住地到乔后，约有十五华里的行程，起初，还打着手电筒，当到达乔后附近一段时，就摸黑行路了，因怕暴露目标，故停止了手电照射。走进乔后西边的一段河沙坝时，开始急行军，加快步伐，好象是通过敌人封锁线似的，真是衔枚急走，鸦雀无声。大约在凌晨四点过钟，到达永安桥北，选择了大路东边山脚的丛林进行埋伏。兵力的配备分为三线、两个阵地。第一线埋伏在仅隔大路十多米的荆棘杂草后面，配备战士六名，都是胆气正，枪法准的同志，如李跃廷、王振邦、寸长生、段嗣宗等。第二线稍后，在离第一线约三十米远的几棵大松树后的一个小山包上，指挥所就设在那里，也配备了六个人，除我和中队长外，还有号兵一人，武装三人。第三线配备战士三人和运输队全部。除了这个主力阵地外，还由分队长何正喜率战士二人到北面距离三百米外的河滩上，选择在一块大石后面埋伏，专门堵截往弥沙方面逃跑